

第八章

“六四事件”（1989～1991）

三宅康之

前　　言

1989年（平成元）4月，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突然逝世。其为人清正廉洁，而且对学生的自由化运动表示理解，因此，深受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爱戴。消息传来，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全国各地立刻举行悼念活动。当时，因官员的腐败和物价飞涨引发的社会不满情绪蓄积已久，悼念活动如滚雪球般逐渐扩大，没过多久演变为对现政权的批判运动。政府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后，学生反响激烈，甚至占领了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要求实行民主。6月4日凌晨，当局派出解放军武力驱散学生和市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反对实行戒严的赵紫阳总书记下台，其后一直遭受软禁，直到去世。

对上述悲剧的称呼因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大相径庭。直到今天，在中国国内从正面讨论其事件仍然是禁忌。在事件结束后不久，偶尔谈论时使用“平定暴乱事件”的说法。近些年才逐渐开始用“八九春夏政治风波”“六四事件”“那一事件”等相对稳妥的词语。虽然也有支持民主化的海外人士称之为“天安门屠杀事件”，但近年通常使用武力行动日期，称之为“六四事件”。另外，还有人为将其与1976年（昭和51）发生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相区别，称之为“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多简称为“天安门事件”。本书统一称作“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给日中关系也带来了很大影响。整个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的基调是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点与欧美发达国家无异。但“六四事件”让日本政府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即究竟与欧美国家统一步调对中国采取严厉制裁，还是优先考虑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以来与

中国建立起的合作关系。况且日本当时正值竹下登内阁因利库路特事件执政仅一年半就下台，宇野宗佑内阁还处在刚刚于 1989 年（平成元）6 月 3 日成立不久的混乱状态之中。

宇野内阁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迈出对华经济制裁的步伐，不过同时也主张不能孤立中国，与欧美国家划清界限。7 月下旬，宇野内阁由于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败而引咎辞职，执政仅 69 天便下台。随后的海部俊树内阁（1989 年 8 月至 1991 年 11 月）基于同样立场，决定要先于欧美各国尽快解除对中经济制裁，并开始准备首相访华。

本章尝试分析从 1989 年春到 1991 年夏日本外交的动因，即从“六四事件”及其后对华经济制裁到解除制裁、恢复关系正常化的日中关系演变过程。

一 从事件发生到决定经济制裁（1989 年春～夏）

1. “六四事件”发生之前

如上一章所述，1987 年的日中关系因各种问题出现动荡。1987 年下半年到 1988 年上半年间，虽然还存在若干摩擦，但日中关系走上改善轨道。1988 年 8 月，竹下登首相访华时宣布将提供 42 个项目、总额高达 8100 亿日元的第三次日元贷款（1990～1995 年），其规模约是第二次日元贷款（1984～1989 年）16 个项目、总计 4700 亿日元的两倍。

作为竹下登访华的礼节性回访，李鹏总理于 1989 年 4 月 12 日至 16 日对日本进行了访问。李鹏总理顺利结束了会见天皇陛下等主要活动后，在回国前一天的 15 日，正在冈山访问期间接到国内发来的一封电报，告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此时大概谁都没有想到一个月后李鹏总理下达“戒严令”。

因对学生运动表示理解而下台的原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后，以北京为首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知识分子举行悼念活动。虽然 22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由共产党主办的正式追悼大会，但其后仍有大约 20 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认为能够说服学生因而慎重对待的赵紫阳总书记访问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北朝鲜）期间，4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以牵制学生，不料反而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另一方面，赵紫阳回国后，在5月3日的“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典礼上称学生运动是“爱国的”，并表示理解。另外在会见亚洲开发银行部分理事会代表时，也对学生运动给予肯定性评价。事态似乎有所好转，在李鹏总理的领导下当局虽然采取了对话策略，但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并未妥协，在具体措施方面毫无进展。因此，5月13日，部分学生在广场上开始绝食斗争。各地学生也大举进京，而且同情学生的市民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约百万人连日出现在街头。

对中国政府来说，非常不幸运的是当时正值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访华，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为此齐聚北京，于是对事件发生全过程进行了现场跟踪报道。5月15日至17日，在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正式访华期间，由于天安门广场被学生们占领，中国政府不得不改变原计划，改在首都国际机场举行欢迎仪式等。

5月16日，在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会谈中赵紫阳总书记表示：“在重大问题上，党今天仍然需要邓小平的领导。自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处理重大问题时，都要听从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这句话被认为要把事态的责任推卸给邓小平，因此，两人之间的彻底决裂已成定局。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回国后，甚至一些政府和党政机关人员都加入到游行中，游行规模进一步扩大。19日，在邓小平家中决定发布“戒严令”（反对“戒严令”的赵紫阳实际上下台）。20日，李鹏总理宣布“戒严令”，在北京市实施戒严。对此，23日约20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戒严令”、要求李鹏总理下台。30日学生们制作的“民主女神”像运进天安门广场。

“戒严令”发布两周后，6月3日当局开始兵力输送和部署，准备投入人民解放军部队。第二天4日凌晨，军队用装甲车和坦克驱赶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

在“戒严令”发布以后直到事件发生，期间出现了许多传言。有人称军队内部有人造反，部队内部出现冲突等。关于死亡人数，政府官方宣布“广场上没有发生死伤”，有报道称死者数千人，也是众说纷纭，异常混乱。^①

^① 1989年9月，李鹏总理向正在中国访问的伊东正义表示，事件中有319人死亡。近年来，时任新华社国内报道部部长的张万舒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确表示是727人，这一数字被认为可信度极高（张，2009）。

7 日，甚至面向北京市内主干道长安街的外资办公室和被分配给外交官的公寓都无差别地遭到枪击，其后每天都有消息报道对民主化运动人士进行指名通缉、逮捕以及判处死刑等。

6 月 9 日，曾谣传去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会见戒严部队，向外界表示依然健在。在讲话中，邓小平强调“继续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在人事方面，23 日宣布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24 日，中共中央第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决定，解除赵紫阳总书记的所有职务。虽然保留其党籍，但直到 2005 年去世，16 年来赵紫阳一直被软禁在北京的家中。

2. 各国对事件的反应

“六四事件”经 CNN 等西方媒体的现场直播即时传到海外，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外界对日本政府面对此事的反应有各种不同评价。为比较、参照，首先来看一下主要国家政府的最初反应。

(1) 西欧各国

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把其事看作内政问题而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与其相反，最先采取严厉措施的是欧共体各国。如后所述，时值法国革命 200 周年纪念，作为西方国家首脑会议主办国，以人权问题为会议主题准备纪念活动的法国是最早、最明确表示谴责的国家。继 6 月 4 日上午法国外长罗朗·迪马 (Roland Dumas) 进行谴责之后，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cois Mitterrand) 也发表声明称：“向年轻人开火的政府没有未来”。6 日，米歇尔·罗卡尔 (Michel Rocard) 总理发表声明冻结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其后法国政府还在巴黎收留了成功逃亡到国外的民主化运动领导人。

继法国之后，6 日，荷兰和瑞典决定冻结对中关系，瑞士暂时停止对华销售武器，西班牙中止高官之间的接触。英国的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首相表示“厌恶与愤怒”之后，同时追加全面禁止对华销售武器的惩罚措施，查尔斯皇太子夫妇也宣布停止访华。联邦德国虽然 6 日表示不会对华进行制裁，但之后也采取了严厉的态度，其中包括无限期延长 ODA 签字仪式，6 月中旬联邦议会和赫尔穆特·科尔 (Helmut Kohl) 总理表示谴责等。

(2) 美国

在美国，1989 年 1 月上台的布什 (George H. W. Bush) 政权出于战

略考量，采取了慎重的应对态度。但议会在同情民主化运动的舆论背景下，要求对残酷的镇压进行严厉制裁，这让曾担任美中联络事务所所长并自认是中国通的布什总统陷入两难境地。事件刚刚发生后，美国时间 6 月 3 日，布什总统谴责“中国政府对和平的游行示威选择使用武力，美国政府对此颇感遗憾”。5 日又宣布了以军事领域为核心的以下“制裁措施”。

停止美国政府和民间层次的对华武器出口；
停止两国军事相关人员的交流；
向在美中国留学生提供延长停留时间等方便；
通过红十字会护理事件中的伤员；
重新审视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

6 日，美国国务院证实反体制物理学家、民主化运动的领导人方励之夫妇从 5 日起接受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保护。另外，美参众两院在 6 日通过谴责决议。8 日，参议院提出要求对中国进行广泛政治和经济制裁的提案。

6 月 12 日，曾公开表示要走日美欧合作路线的布什总统向各国非正式探询采取共同制裁措施的可能性（《朝日新闻》1989 年 6 月 13 日晚报）。

（3）日本

就在中国各地学生运动日渐高涨时，掌握自民党的最大派系、被认为将是长期执政的竹下登内阁因利库路特事件造成的政治不信任，于 4 月 25 日宣布引咎辞职，选择接班人的条件就是没有参与利库路特事件。在这个消极条件下，6 月份，中曾根派的重要人物、曾在竹下内阁担任外相的宇野宗佑被选中。竹下内阁下台和宇野组阁都发生在事件爆发前夕的 6 月 3 日。此时，预定在 6 月底的日美经济协商会议、7 月中旬的西方国家首脑会议等重要事务已排满外交日程，政权中枢根本无暇顾及中国的情况（御厨、渡边，1997）。

6 月 4 日，流血事件发生前，日本政府与其他国家一样，把民主化运动和中国政府的处理办法看作是中国内政问题，静观其变。5 月 20 日，“戒严令”发布以后，宇野外相曾表示“忧虑”。但 5 月 24 日依然在东京签署了第二次日元贷款最后一个年度——1989 年度的 971 亿日元贷款合同。这是“戒严令”发布后，外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的首份合同。

事件发生的 6 月 4 日，日本政府的第一反应是由外务省新闻发言人渡边泰造所发表的讲话：“对事态发展成流血事件深表忧虑，日本政府强烈希望事态不要继续恶化”。同一天外务省劝告日本国民谨慎前往北京，三塚博外相表示：“希望中国早日恢复平静”。

6 月 5 日上午，宇野首相面对记者团的提问时表示“非常忧虑”。内阁官房长官盐川正十郎在同一天的记者会上也表示：“不能不说非常遗憾”。但在对华制裁问题上，第二天 6 月 6 日，宇野首相和三塚外相都表示目前还没有考虑赞同制裁措施。对于政府慎重的处理态度，尽管来自在野党和经济界的批判之声四起，但其中有优先考虑在华日本人安全的因素（盐川，2009）。

在事务层次，6 月 5 日通商产业省决定无限期延长原定于 7 日举行的日中投资促进机构设立大会，9 日明确表示将从 12 日起提高对华贸易保险费率。7 日外务省劝告日本人谨慎前往中国全境，日本驻华大使馆向滞留在北京市内的日本人发出躲避规劝后，临时撤回约 5000 名日本人，并为此项工作忙得不可开交。^①

在制裁问题上，宇野首相在 6 月 7 日举行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了如下答辩：“必须自觉认识到日中关系与美中关系完全不同。我们过去曾与中国处于战争关系，有鉴于此，现在中国处于混乱之际，我们更应该避免断定是非曲直的发言。但必须指出的是，把枪口对准国民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希望能尽早恢复平静。”同一天，外务事务次官村田良平向驻日大使杨振亚表达了谴责之意，“虽然无意干涉内政”，“但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讲，无法容忍”。随后，宇野首相也在 8 日举行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明确表示否定制裁的意见：“采取制裁措施对于邻国来说有失礼仪，希望事态能够尽快恢复正常，所以，不会进行抗议”。在日元贷款问题上，13 日外务省长官表示，“为帮助他国发展并已约事情与人道问题是两个问题。约好事情希望按照约定继续履行”，否定中止一说。直到 6 月下旬，虽然依旧对人道问题表示忧虑，但继续维持不干涉内政的立场。

^① 生产线刚刚完成安装的次日就遭受“六四事件”影响的北京松下显像管工厂没有让员工回国，而是继续作业，因此得到了中国当局的感谢。据北京松下显像管工厂的记录员介绍，2003 年 3 月 2 日。

不过到6月中旬，日本工商业者陆续回到北京。对此，欧美各国纷纷担心日本“趁火打劫”，独占中国市场，因而骂声不断。^①于是，三塚外相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上发言称：“必须要求经济团体、产业界保持克制”。受此指示，22日外务省向日本工商会议所、经济团体联合会和经济同友会致函，要求“希望谨慎处理各企业驻外工作人员的归任和出国”。

3.6 月下旬以后事态发展

另一方面，“六四事件”后，中国陆续对民主化运动人士进行检举和判处死刑。参与上海郊外烧毁列车事件的3名被告被判死刑，尽管西方各国要求宽恕，但依然在判决仅一周后的6月21日执行。次日，又有7人因在动乱之际犯下重大经济案在北京被判处死刑（《朝日新闻》1989年6月22日、23日）。

在上海死刑执行以后，世界各国采取了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22日，奥地利政府决定召回驻华大使，接着意大利于23日宣布延期批准新一轮ODA，秘鲁宣布冻结提供贷款并中止对新开发计划提供援助。联邦德国也于23日拒绝召开经济贸易合同委员会，24日宣布取消缔结新一轮ODA协商和推迟今后ODA计划的制裁方针。英国首相撒切尔虽然表示“事件令人毛骨悚然”，但又在22日表示，“对华进行经济制裁将会使香港居民陷入非常危险的状态，并造成恐慌”，所以不会对华实行经济制裁。

其后在6月26日，欧共体召开外长会议，制定共同制裁方案。第二天27日，欧共体首脑会议也一致决定严格对应，并出台以下几项制裁措施。

要求中国政府接受中立监视团调查民主化运动审判、被捕者狱中情况；

停止对华军事合作，禁止对华出口武器；

停止与中国部长级高层接触；

延期新对华经济合作项目；

限制文化、科学技术合作；

许可在欧中国留学生申请延长签证请求。

^① 如：“Japan and China: Thieves at a fire” *Economist*, July 1, 1989, p. 47.

美国政府从 6 月 20 日至 21 日发表“第二次制裁措施”。主要内容如下。

停止所有政府间武器销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
全面停止政府间高层交流（副部长以上级别）；
准许延长在美中国人滞留期限；
在与美国友邦和同盟国协商的基础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延期审查对华新贷款。

然而，美国在宣布制裁措施的同时，21 日布什总统秘密将一封亲笔信交给邓小平，并要求派密使与邓小平进行彻底且坦率的会谈。很快，第二天邓小平就发出同意的回信。7 月 1 日，布什秘密派国家安全保障顾问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到中国，2 日上午与邓小平、李鹏和外交部部长钱其琛进行了会谈。会谈中两位密使向中国传达了制裁是依美国的舆论和议会在策略上采取的措施，而布什政权非常重视自尼克松政权以来与中国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派遣密使事件于 12 月中旬被 CNN 曝光）。

美国发表“第二次制裁措施”前后，在日本，官房长官盐川在 21 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具体的措施尚未决定”。另一方面，日本外务省却已于 20 日宣布暂时“冻结”1990 年度即将开始的第三次日元贷款准备工作和新一轮无偿援助的方针。29 日，宣布暂停部长级的对华接触。日本进出口银行也宣布延期讨论新项目。

日本政府已从最初的方针开始转换并迈出事实制裁的第一步。有关这段时间内的调整情况目前尚不清晰。估计应该是在首相官邸和外务省的领导下，为配合三塚外相即将访美（下述），在探讨对华政策内容和发布时间并观察各国反应和方针后做出的决定。

6 月 26 日，三塚外相在华盛顿会见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就中国问题进行协商。因为该会谈原本要讨论日美经济摩擦，如果日本在中国问题上采取亲华态度，担心日美关系将更加复杂化。日本向美国说明事实上冻结 ODA 新项目、要求民间企业注意避免招致国际社会误解等一系列对策，与美国政府达成共识。

但是，美国议会要求进一步采取严厉的措施。6 月 29 日，美国众议院以 418 票对 0 票通过《对外援助委员法案》。其主要内容在原来禁止出口

武器的基础上又增加以下内容：要求国外民间对华投资公司附加新担保条件、立即中止——促进美中贸易的一切活动、开发原子能的合作关系、对华销售美国造人造卫星以及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发起的放宽对华转移尖端技术规定等。7月14日，相同内容的《对华制裁法案》在参议院以81票对10票获得通过。

从以上过程来看，日本政府的应对态度顾及中方情感，因为避免使用“制裁”字眼，所以，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显眼，虽然在日本国内被批评为态度模糊，但在中国看来，日元贷款是经济建设必需的主要外资来源，所以其冻结实质上比欧美各国的制裁措施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那么，面对各国的制裁措施，中国采取了怎样的对策呢？据中国原驻日大使杨振亚的回忆录介绍，7月6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的驻外使节会议上，对日本的工作成为重点。也就是说，会议方针是要让日本在西方国家中先一步解除对中制裁。

接受驻外使节会议上确定的方针回到日本的杨振亚大使首先接触了外务审议官栗山尚一、二阶堂进、伊东正义，经团联会长齐藤英四郎、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河合良一等政经界要人。8月9日，海部内阁成立后，又重点接触了对内阁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原首相竹下登。与此同时，中国驻日使馆在日本各地通过举办讲演会和交流项目开展宣传活动，努力进行对日工作（杨，2007）。

4. 巴黎峰会与对中制裁

如同前述，西方七个发达国家决定为纪念法国革命200周年于19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第15届首脑会议（巴黎峰会）。从1988年底，各国代表多次召开预备会议，日本政府派出外务审议官国广道彦参加。

“六四事件”发生后，以东道主法国为首，欧美各国计划出台制裁措施，与其不同，只有日本反对对华制裁。日本支持中国的态度被认为是为经济利益，尽管国广阐明日本立场，但直至峰会召开当天，日本的孤立状态依然没有改变。据国广回忆，直到13日布什总统到达听取简报并表示赞同日本方案后，局面才有所好转（近代日本史料研究会，2008）。

在措辞方面，宇野首相提出巧妙的解决方案。最初欧美各国没有接受日本提出“不使中国陷入孤立”的意向，但宇野首相向法国代表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建议，使用“中国自身防止孤立化”的说法，把中国变成主语，才被接受。

在与首脑会议同时召开的外长会议上，三塚外相做了热情洋溢的答辩。7月上旬出席峰会前，三塚外相出席在文莱召开的东盟外长扩大会议（文莱），听取东南亚各国的意见，一致认为不稳定且排外的中国不利于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峰会召开前夕，日本又在日英外长会谈和日美外长会谈中，对不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一事获得了两国的理解。所以，在外长会议上，以美国国务卿贝克为首，英国、加拿大外相都对三塚的发言表示赞同。

在上述状况的影响下，14日晚制定出声明的最终草案，宣言内容采纳了日本的意见。15日，巴黎峰会采决的政治宣言中“有关中国宣言”内容如下。

我们已经对中国无视人权的残酷镇压进行了谴责。我们强烈要求中国当局停止对那些只是主张民主主义和自由等正当权利的人们所做的行为。

鉴于这种镇压，我们表示严厉谴责，停止两国间部长级和其他高层的接触，若与中国之间存在武器贸易，将采取中止贸易等妥善措施。进而鉴于目前经济的不确定性，我们同意世界银行延期审查新投资项目的决定。我们还决定，如果中国留学生有意愿，将延长其滞留期限。

我们期待中国当局重启政治、经济改革和面向开放的动向，以避免中国的孤立化，并尽早创造出回到合作关系的条件。我们理解自事件以来香港人民的深切忧虑，对此，我们感同身受。我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恢复香港对其的信任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认为，国际社会的持续支援将成为保持对香港信任方面的重要因素。（外务省编，1989）。

也就是说，峰会只列举了各国此前所做的制裁，却回避进行新的制裁。其传递出如下信息：如果中国继续保持改革开放路线就准备恢复关系（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2005b）。不过宣言没有明确说明解除制裁的具体条件，如同后述，日本政府的方针也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变化。

那么，中国政府对巴黎峰会反应如何？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其批判为干涉内政，但并没有点名批判日本。1990年5月7日，宇野

前首相访华时，江泽民国家主席还直接表达谢意：“中方赞赏日方在峰会中主张不应孤立中国的做法”（村田，2008）。

二 两国为解除经济制裁进行摸索 (1989年夏~1990年夏)

1. 日中动向

在日本，组阁后不久，宇野首相个人就被曝光女性丑闻，支持率一直低迷不振。受此影响，宇野内阁因在1989年7月23日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承担责任，上台仅两个月即辞职。经过8月8日举行的自民党总裁大选，海部俊树内阁诞生（9日）。

宇野政权末期，8月1日，当时正处于柬埔寨和平问题巴黎会议期间，三塚外相在巴黎与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会谈，传达了“如果中国恢复到过去，希望重新开始经济合作”的信息（此前7月底，美国贝克国务卿曾经与钱其琛外交部部长会谈）。8月7日，四川省等地发生大规模洪涝灾害，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从人道主义出发”，提供总价值200万美元（约合2亿6200万日元）的紧急救助。

那么，新政权的对华政策如何呢？

新内阁组阁后，在8月11日举行的首次记者会上，面对《人民日报》记者对今后日中关系走向的提问，海部首尔回答说：“中国永远都是非常重要的邻邦。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日本给予善意的合作，为两国关系更进一步发展而努力”。并于18日在解除谨慎赴中（除北京以外）劝告的基础上，决定重新启动已有的援助项目。^① 不过，对于新项目还需要慎重讨论。在政府高层交流方面，29日，日本外相中山太郎利用柬埔寨和平问题巴黎会议之机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举行了会谈。

接着在9月17日至19日，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原副首相伊东正义应中日友好协会邀请率团访华。对此中方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款待，是邓小平在事件发生后首次会见外宾，也是江泽民总书记就任以来第一次有机会与西方实力派政治家进行会谈。表面上会谈过程中并没有谈及日中之间

^① 虽然最早宣布解除冻结的是日本，但对于已有议案，法国原本就没有停止援助。同时请参照第174页注释2。

的经济合作，但中方已经表示只要日本贷款难以确定就无法制定 1990 年度预算，因此，强烈要求解除冻结（《日本经济新闻》1989 年 9 月 21 日）。^①

回国后，伊东团长在首相官邸所作的访中报告中指出，尽管中国对镇压民主化运动的反省不足，但改革开放路线不会改变，建议尽早实施第三次对中日元贷款。尽管日本政府依然慎重，但 9 月 25 日还是宣布解除谨慎前往北京的劝告。与此同时，政治经济界也再次迎来访华高峰。

在经济界方面，9 月下旬先有 20 名经济界首脑访华，紧接着在 11 月上旬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11 月底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樱内义雄等人相继到中国访问。9 月下旬，包括自民党竹下派 15 名议员在内的 150 多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大型议员访问团到中国访问。尽管中国有解冻日元贷款的请求，但并没有出现改善关系的具体信号。

虽然日本政府、经济界已经开始积极行动，但日本对中国的舆论变化至关重要。政府 1989 年 10 月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回答“对中国持有亲近感”的人数占 51.6%，比 1988 年大幅下降了 16.9 个百分点（内阁府“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

峰会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开始逐渐改善，9 月至 10 月间，还出现了直接修复关系的行动。10 月四川大地震后，世界银行出于“人道主义”救援，决定提供 3000 万美元的贷款。虽然 10 月中旬十四世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出现了令中国不愉快的一幕，但美中友好的核心人物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相继于 10 月底至 11 月初和 11 月中旬到中国访问，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要人举行会谈，并在回国后向布什总统转达了中方的信息。^② 美国议会的态度依然强硬，参众两院的两院协商会统一制定了对华制裁法案，但 11 月 21 日总统行使了否决权。

这一趋势从原日本驻美大使松永信雄的证词中也可窥见一斑。据松永称，11 月中旬当他即将离任时，曾受邀与尼克松总统进行面谈。尼克松总统说不能永远让中国陷入孤立，但美国难以在这件事上采取主动，所以提议日本不妨大胆采取主动。另外松永听到消息称，世界银行总裁巴伯·科

^① 中国的财会年度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② 虽然中国允许方励之夫妇出国和美国解除制裁被联系到一起，但是在美中两国谁掌握主动权问题上遇到了意外的障碍（Kissinger, 2011）。

纳布尔（Barber Conable）正在重新讨论对中贷款，因而回国后马上向海部首相提议重启对中贷款一事，日本应该采取主动（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2005d）。美国政府大概认为，与其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日本和日中关系，还不如让日本充当马前卒更为有利，因而持欢迎态度。

日中关系和美中关系自1989年秋天开始大规模朝修复方向发展，受此影响，直到10月份，中国的对日友好姿态和对日工作非常积极。但11月上旬，中国政府试探部长级官员访日遭拒后公开表示不满。在11月10日开始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访华期间，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郑拓彬警告说：对华进行经济制裁将会给日本也带来困难和损失，并表示“尽早解除对双方都有利”，促使日方对解除贷款冻结做出积极反应（《日本经济新闻》1989年11月11日）。李鹏总理也讽刺日本说“西方七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制裁各不相同。有些国家虽然严厉，但私下里正在与中国开展许多工作。有些国家虽然嘴上不说，但也不作为”（《朝日新闻》11月13日晚报）。^①

在中国态度逐渐强硬的这一过程中，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为出席第四届日中友好交流会议于11月20日到日本，首相夫妇、外长和政党要人与其举行了非正式会谈。受此鼓舞，中方重新燃起了解除冻结的强烈愿望。11月29日，李鹏总理接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樱内义雄为团长）时也提出希望日方迈出“大胆的一步”。

进入12月，日本逐渐开始采取一些具体行动。5日签署了1989年度的四个无偿资金援助项目，共计48.76亿日元（这些都是“六四事件”前决定的项目）。17、18日，召开了第五届日中文化交流政府间协商会议，确认重启文化交流。

12月中旬，从美国来了两个较大推动。一是美国总统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宣布访华；另一个是20日报道说美国正在讨论包括批准对中出口通信卫星、美国进出口银行将重启贷款等在内的放宽制裁措施。^②因此，海部首相明确表示，将积极地、真正地改善对中关系。26日，在与结束访华的社会民主连合常任顾问田英夫的会谈中，海部首相明确表示了三点：第一，

^① 李鹏的发言指法国。参照《日本经济新闻》1989年11月11日。

^② 不过斯考克罗夫特的访中违反了峰会约定，也触犯了日美合作，对此日方表示遗憾。与中国之间存在香港问题的英国也于12月上旬派遣了首相外交顾问。

在外务省内部设置项目团队；第二，派遣经济合作局局长松浦晃一郎访华与中国进行协商；第三，邀请适当的中国人访日（《日本经济新闻》1989年12月27日）。

12月下旬，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șescu）政权垮台，东欧的民主化进程迅速发展，这让提高警惕的中国当局在解除“戒严令”上显得遥遥无期。^①但日方仍按照既定方针，于1990年1月8日正式决定派遣松浦局长访中以听取中国的意见。正当此时，1月10日，中国政府在时隔八个月后宣布解除“戒严令”。对日本政府而言，这是解除经济制裁、重新开始贷款活动的最佳信号。美国方面，世界银行也决定放宽关于人道主义援助活动的对华贷款条件。

似乎预见到松浦局长即将访华，“戒严令”解除之后还不到一个星期，1月16日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邹家华应日本外务省及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邀请，赴日参加纪念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立35周年活动，与日本协商开始第三次日元贷款问题。由于邹家华兼任国务委员，因而成为事件发生后第一个访日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副总理级以上）。访日期间，除海部首相、中山外相以外，邹家华还会见了竹下登原首相、伊东正义、安倍晋太郎等重要政治家，还在近800位经济界人士面前进行了演讲（杨，2007）。1月18日，松浦经济局局长访华，双方就开始筹备第三次日元贷款达成一致。

此时中国经济困难日益严峻，甚至开始向日本民间银行申请贷款，所以，对重启贷款期望很高。但1月下旬以后，日本政府的态度又转为谨慎。这是受日美经济摩擦迎来高峰、美国议会严厉批评布什的对华外交、世界银行重启贷款也尚未正式实施等影响，日本政府不得不顾及美国议会并做出退步，向下述方针倾斜，即探讨通过日中投资促进机构和日中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等“民间”组织以维持关系。

然而进入2月份以后，8日，世界银行董事会决定部分重启对华贷款新项目（对农业项目提供6000万美元的信用资助），美国进出口银行也于2月初决定对华贷款9万美元作为天然气开发的计划资金。

^① 不过，据钱其琛回忆，中国并没有像美国所说的那样在改善对美关系问题上倒退，而是美国无法判断中国是否能够在东欧激变中挺得住，所以态度开始消极，不再急于改善关系（钱，2003）。

受世界银行等动向的影响，日本的态度再度积极起来。3月2日，中山外相在第118届国会上发言表示：今后日中双方要为两国尽早恢复到过去的关系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全国银行协会联合会为重启贷款新项目，决定于3月上旬派遣访华团，共67家日本银行参加。3月20日，李鹏总理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做政府报告，表示“希望中日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尽快恢复正常”。

接着在4月份，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倡导早日恢复论，原政调会会长渡边美智雄也提出独自判断论。在野党方面，日本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呼吁早日恢复，以钢铁界为首的经济界也给予支持。^①各界为在恢复贷款后的对华关系和国内政治中提高发言权，都争先恐后地行动起来。

关于对华投资，1990年3月29日日中投资促进机构成立大会召开以后，在日本兴业银行会长池浦喜三郎带领下，大型投资环境考察团共计70多人到中国各地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6月7日，中方成立相应的中日投资促进委员会。

在政界，执政党和在野党双方都相继访华。4月9日至12日，自民党国际局局长爱知和男一行访华，建立了自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正式关系。4月23日至26日，原防卫厅长官加藤纮一带领自民党议员访华团，4月30日至5月4日原政调会会长渡边美智雄率领议员团，5月1日至6日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原建设大臣野田毅等相继到中国访问。

在野党方面，日本社会党书记长山口鹤男5月中旬到北京访问，约定将推动政府重启日元贷款。5月底，池田大作名誉会长任代表的多达300人的大规模公明党代表团访问北京。

这样一来，1990年春，政治、经济界尽早恢复日元贷款的呼声日渐高涨，通产省、大藏省也都积极活动谋求尽早恢复。但另一方面，美国从4月下旬到5月中旬，以采取共同步调为由牵制日本，表示“慎重应对是重要的”（《朝日新闻》1990年4月26日、5月19日晚报）。外务省出于顾及欧美的慎重论立场，把时间定到7月休斯顿峰会协商后再宣布解冻。政府也遵循这一方针，没有在峰会召开前恢复贷款（《日本经济新闻》1990年4月10日晚报、《朝日新闻》1990年4月11日晚报）。

^① 杨振亚主张“在我方的推动下，日本各界（对恢复日元贷款。——引者注）重启的呼声高涨”（杨，2007）。

促使情况发生变化的是受美国大使馆保护的反体制派物理学家方励之夫妇出境问题的解决。5月底布什总统决定无条件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此同时，5月至6月，中美之间多次进行秘密交涉，方励之夫妇终于在6月25日顺利出境。^①中美之间象征性的人权问题悬案解决后，再加上日美贸易结构问题协议也形成最终报告，所以，日本政府也较容易于此时开始改善日中关系。

2. 休斯顿峰会

在方励之夫妇出境问题解决之前，日本政府就与美国政府保持紧密合作在私下运作，目的是为在7月召开的休斯顿峰会上实现日元贷款解冻。首先要把解冻日元贷款问题提到峰会议题上。继5月22日原自民党政调会长渡边美智雄在访美期间与贝克国务卿举行会谈后，6月15日日美外长会谈确定把解除冻结贷款问题提到峰会议题上。6月21日原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作为政府特使访美，布什总统对他明确表示，将在峰会上与海部首相进行会谈。受方励之出境事情的影响，峰会上日美合作推动恢复日元贷款。^②

峰会前夕，6月30日至7月8日，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受邀参加“花与绿色国际博览会”访日，这是继邹家华之后第二位访日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与李铁映会见时海部首相表示将在休斯顿峰会上介绍中国的情况，同时也要求中国进一步释放政治犯。

实际上，早在休斯顿峰会举行前夕，日美就举行了首脑会谈。海部首相相对布什总统传达了日本将要解除冻结第三次对华贷款的方针，对此，布什总统表示理解。

在1990年7月9日至11日召开的休斯顿峰会上，日本开展独立外交，其提出的自我主张备受瞩目。据海部首相证实，有关日本重启提供日元贷款的方针，除布什总统以外，英国因为香港回归迫在眉睫，需要日本的支持，所以，撒切尔首相表示出友好的态度，但德国重视俄国问题，所以，科尔首相持否定态度。结果，贷款问题既没有提到正式议题中，也没有记载到文件中，而是以默认的形式求得各方对日本解除冻结

^① 据说背后是驻华大使桥本的斡旋发挥了作用，《产经新闻》2007年6月18日。

^② 据时任事务次官的村田良平说，1990年5月，与美国的意见调整已经结束（村田，2008）。

贷款的理解，欧美各国也对此表示谅解。另外，布什总统还额外要求日本“希望慢慢进行，不要造成消化不良”（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2005a）。

在7月9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在日本的努力下，有关中国部分写入以下肯定性评价（《日本经济新闻》1990年7月11日晚报）。

我们对中国最近的事情进展迹象表示肯定，通过进一步的政治、经济改革，尤其是在人权领域的改革，相信未来的合作关系将会更加紧密。我们一致决定，在接受过去一年间修正结果的基础上，维持去年峰会决定的措施。随着中国更进一步的进展，我们也会相应地做出调整，将继续评估这些措施。比如，在基本生活相关的已有贷款的基础上，摸索从世界银行其他贷款项目中资助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环境领域是否存在值得关注的投资领域。（外务省编，1990）。

也就是说，各国都同意世界银行重启贷款，提出了与中国关系迈向正常化的方向。

中方的反应，从在峰会结束后的7月12日李鹏总理对联合参议院访华团表示“由衷赞扬这一积极态度”的发言中可见一斑。

7月16日，外务审议官小和田恒作为首相特使访华，传达了重启第三次日元贷款（1990~1995年，共计8100亿日元）的方针。同一天，三塚博原外相等安倍派议员访华。24日宫泽喜一原副首相带领自民党访华团访华。9月份，竹下登原首相访华，这些访华团分别向中国传达了提供援助的方针、实施程序和重启的正式决定。

11月2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决定解除冻结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应布什总统在休斯顿峰会上提出的请求，贷款并非一次性付清，采取分三次支付的形式。同一天，第三次日元贷款中1990年度第一期7个项目、共计365亿日元资助在北京举行交换公文仪式，第二期和第三期的资助也分别于12月21日和1991年3月15日在桥本恕驻中国大使和齐怀远副部长之间交换了公文。但投资事业的领域是为稳定民生做贡献的内容，仅限于与过去日元贷款项目带有连续性的部分，所以是“部分解除”。

三 走向恢复关系正常化（1990年 夏～1991年8月）

1. 海部首相访华前期准备

因为海部首相访华象征着日中关系的全面正常化，所以受到日中双方的高度重视。尤其是中国积极行动，除中国驻日大使与竹下登原首相等政界实力派人物会见以外，中国领导人也向到中国访问的日本政治家表示希望早日实现首相访华。

1990年8月发生在科威特的海湾危机对日本而言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但是，对中国来说，却成为改善美中关系的一次意外之机。同年秋举行联合国大会，在安理会上，由于对伊拉克制裁方面的所有决议投了赞成票，中国采取与美国合作的态度，美中关系得到改善。由此，日中关系的改善也能够顺利地进一步发展。

9月22日，日本原首相竹下登和文部相保利耕辅出席了亚运会开幕式。虽然这是保利作为现任内阁成员在事件后的第一次访华，但其活动仅限于和开幕式相关的活动。对于和中国领导人会面，保利表现谨慎，显然优先顾及国际反应。

11月11日，吴学谦副总理作为中国政府代表赴日出席日本天皇即位典礼。在与海部首相的会面中，吴学谦一方面对海部首相为恢复和改善日中关系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同时希望海部首相在合适的时机访华，海部对此也表示赞同。

尽管如此，也不能立即就启动首相访华。1991年上半年，首先重启部长级官员访华。1月8日，在改善对华关系上表现积极的日本大藏相桥本龙太郎访华。访问期间，双方就中国政府在日本市场发行债券、批准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日本进出口银行提供第三次资源开发贷款问题举行谈判达成一致。

接下来在3月下旬，日本通商产业相中尾荣一访华，传达了要把对华出口保险费用率降低至“六四”以前水平的意向。5月上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李岚清进行了回访，率先实现了经济部部长的互访。

与此同时，中山外相4月5日至7日访华，表示海部首相有意在年内访华。这是自1988年以来外相首次正式访问中国。为了不错过这一好时

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也于 6 月 25 日至 28 日到日本访问，就海部首相访华、日中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纪念活动、天皇陛下访华等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参照第九章）。

2. 海部首相访华

1991 年 7 月 16 日第 17 届主要国家首脑会议（伦敦峰会）上发布的“议长声明”中有关中国的内容如下。

我们欢迎中国在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围绕其他地区问题上所采取的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态度。尽管我们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依然表示忧虑，但也希望看到该国在经济、政治两方面的改革中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在过去的一年里，重新启动了与中国人士的交往，这一趋势应该继续保持。美国无条件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外务省编，1991）

经历了这一系列过程，8 月 10 日至 13 日，海部首相对中国进行访问。海部首相访华的意图早在峰会期间就已经向布什总统传达并获得谅解（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2005a）。从此日中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海部也成为西方国家中最先访华的国家领导人。在日元贷款方面，日方一次性提供了 1991 年度的 1270 亿日元的贷款，前一年度的“部分解除”也变成“全面解除”。

另一方面，海部首相访华期间也向中国提出要求，希望其积极处理人权、民主、裁军和军备管理等问题。他在访华过程中首次提出的“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概念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方面，李鹏总理也在会谈中表示“高度评价日本为恢复中国与西方各国关系中所做的努力”，同时宣布原则上加入《核不扩散条约》(NPT)，表示出对日本的顾及。

但中国并不满足于首相访华，还进一步为实现天皇和皇后访华积极工作，这一点将在下一章详述。

结语

回首往昔，1989 年是日本经济的一个高峰期。冷战进入结束阶段后，

战胜国看到西德与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荒芜中复兴，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日美经济摩擦引人关注，“日本异质论”也浮出水面。在自民党一党优位体制政权逐渐衰退的先兆中，遭遇“六四事件”、日美结构协议等国际性难题。

“六四事件”后，日本政府顾及与中国的关系，在“六四事件”前后处理态度极为慎重。虽然事后作为西方各国的一员，曾宣布冻结日元贷款，但始终保持了支持中国的态度，以至于在巴黎峰会上一度被孤立。此后在恢复ODA、现任部长级官员和首相正式访问等问题上站在了与中国修复关系的前列。

对日本的这种对华外交，中国方面把日本看作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华包围圈中的“弱小环节”，强调积极展开对日活动并取得成果是自身的外交战略（钱，2003）。有一点中国虽然没有强调，却不容忽视，那就是正因新一轮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行都离不开日本的第三次日元贷款，所以，中国才重视对日工作。

日本为顾及中国背负了风险并付出牺牲，包括欧美各国认为日本缺乏人权感觉，是优先考虑工商业利益的“异质”。正因如此，所以在对华关系中“抢头功”成为大忌，触动了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和处于美国影响力之下的世界银行的敏感神经。

这样看来，日本外交在内外压力下处于被动，由于战争责任问题和中国商业机会的考虑而对华宽容，追随美国，给人以优先考虑经济界利益的印象。实际上，现在也批判日本外交是在西方各国和中国的要求和压力下而左顾右盼。

但这样的批评并不恰当。以经济界的利益而言，对华ODA自身对处在顶峰时期的日本企业来说，其重要度未必很高。以外交方面而言，在各种峰会的协商达成一致以后，迈出最重要一步，采取欧美也容易明白的推进方式，并不是被动的、临时的外交所做的事情。

日本这种踏实稳健的外交路线的基础是以把中国引入国际社会为目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就始终贯彻的对华政策。很明显，如果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倾向于排外的民族主义，不仅对日本甚至对亚太乃至全世界，都将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或者中国经济发展失败，内政混乱并陷入大量难民出现的局面，也是一个噩梦。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与日本的国家利益相一致，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使中国陷入国际社会的孤立，引起改革

开放政策倒退的事态发生。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政、官、经济界虽然表现暧昧，但存在一定的共识。

然而，尽管存在共识，并非就意味着日方就是铁板一块。不论是外务省，还是自民党内部，粗略划分的话基本上存在两派。一派是“欧美派”，另一派是“亚洲派”。前者考虑到与西方统一步调，后者则重视亚洲的特殊情况（和日本的独立外交）。事件发生后不久，可以理解为两者态度一致，决定冻结日元贷款（五百旗头、伊藤、药师寺编，2008年；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2005c）。但在面临恢复贷款的情况时，最终后者压倒前者，实现了日元贷款的早日重启和首相访华。

最后，必须附加一句的是，日中政府间的关系虽然恢复到“六四事件”发生前的水平，但日本的对华舆论却发生决定性变化，此后一直都保持了严肃的态势。政府1989年10月进行的舆论调查（内阁府“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显示，回答“对中国持有亲近感”的人数占51.6%，比1988年大幅下降了16.9个百分点。此后虽然有些许回升，但日本人的对华亲近感再也没有恢复到事件发生前的高水平（田中，2007）。

总而言之，通过日本充当马前卒，欧美各国对华关系的改善也变得容易起来。1990年10月举行的欧共体外长会议正式决定除武器出口以外，全面解除对华制裁。在西方国家重要人物中，1991年9月与中国之间存在香港问题的英国的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访华，此后意大利总理也访问中国。同年11月，美国的国务卿贝克访华。至此，美中关系名符其实地恢复正常，逐步走出“六四事件”的阴影。

参考文献

五百旗头真、伊藤元重、药师寺克行编《90年代の证言 冈本行夫 贯彻现场主义的外交官》，朝日新闻出版，2008。

外务省：《外交蓝皮书 平成元年版》，大藏省印刷局，1989。

外务省：《外交蓝皮书 平成二年版》，大藏省印刷局，1990。

外务省：《外交蓝皮书 平成三年版》，大藏省印刷局，1990。

霞山会：《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 1972~2008年》，霞山会，2008。

近代日本史料研究会：《国广道彦（原驻中国大使）口述历史》，近代日本史料研究会，2008。

盐川正十郎：《凡人的告白 轨迹和证言》，藤原书店，2009。

徐显芬：《日本对中国 ODA 外交 利益、权力、价值本论》，劲草书坊，2011。

徐承元：《日本的经济外交和中国》，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4。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C · O · E 口述历史 · 政策研究项目《海部俊树（原内阁总理大臣）口述历史》，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经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2005 (2005a)。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C · O · E 口述历史 · 政策研究项目《栗山尚一（原驻美国大使）口述历史：转换期的日美关系》，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经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2005 (2005b)。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C · O · E 口述历史 · 政策研究项目《谷野作太郎（原驻中国大使）口述历史：柬埔寨和平与日本外交》，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经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2005 (2005c)。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C · O · E 口述历史 · 政策研究项目《松永信雄（原外务事务次官、原驻美国大使）口述历史》，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2005 (2005d)。

孙基燮：《日本对中援助外交——第三次对中日元贷款的冻结及恢复的实证分析》，富士复印件《纪念小林节太郎 1998 年度资助研究论文》，2000。

高木诚一郎：《天安门事件和美国及西欧各国》，《岩波讲座 现代中国 别卷 1 民主化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岩波书店，1990。

田中明彦：《日中关系 1945 ~ 1990》，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

田中明彦：《在亚洲的日本》，NTT 出版，2007。

田中明彦：《天安门事件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国际问题》1990 年 1 月，第 358 期。

ジェームズ・マン (Mann, James)，铃木主税译：《美中奔流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共同通信社，1999。

御厨贵、渡边昭夫（采访构成）：《首相官邸的决断——内阁官方副长官石原信雄的 2600 日》，中央公论新社，1997。

村田良平：《村田良平回忆录》下卷，() 书房，2008。

李洁明，西仓一喜译：《中国通：亚洲冒险、间谍与外交生涯九十年 美国原驻中国大使回忆录 1916 ~ 1991》，草思社，2006。

Baker, J. ,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Putnam, 1995.

Bush, G. and B.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Knopf, 1998.

Kissinger, H. , *On China*, Penguin Press, 2011.

Lampton, D. ,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the U. S. China Relations*, 1989 ~ 20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日译本：滨本良一：《钱其琛回顾

录》，东洋书院，2006)。

杨振亚：《出使东瀛》，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7。

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天地图书，200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